

总主编 霍松林
主编 尚永亮

诗韵华魂

先秦汉魏六朝

诗歌精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曲江出版传媒集团

詩韻華魂

先秦漢魏六朝

詩歌精選

總主編 霍松林

主編 尚永亮

選注

葛剛岩 黃超 薛泉
葉黛瑩 吳大順 尚永亮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西安曲江出版傳媒集團

图书代号 SK9N038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秦汉魏六朝诗歌精选 / 尚永亮主编.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4
(诗韵华魂 / 霍松林主编)
ISBN 978-7-5613-4634-1

I. 先… II. 尚… III. 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先秦朝代—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I22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43808号

诗韵华魂

先秦汉魏六朝

诗歌精选

主 编 尚永亮

出版统筹 刘东风 孟瑶月 冯晓立

责任编辑 侯海英

书籍设计 敬人设计工作室 吕敬人+吕旻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邮政编码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50mm 1/16

印 张 134.25

插 页 4

字 数 2184 千

版 次 2009年5月第二版

印 次 2009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4634-1

定 价 680.00元 (全六册)

《诗韵华魂》丛书编委会



名誉主任

蔡武	铁凝	赵乐际
袁纯清	孙清云	陈宝根
霍松林	贾平凹	

主任

段先念	高经纬
-----	-----

副主任

吴克敬	李元
-----	----

委员

杨恩成	欧阳光	尚永亮
王泽龙	王兆鹏	李浩
赵文涛	范超	孟瑶月
刘蓓	刘东风	冯晓立

总 序 言

西安是周秦汉唐之都，也是中华诗歌之都。第二届中国诗歌节于2009年5月在西安举行，雁塔日丽，曲江花繁，堪称“四美具，二难并”，可喜可贺。第二届中国诗歌节执行委员会决定精选上起先秦、下至当代的中华诗歌代表作，共分五卷，名为《诗韵华魂》，精装出版。这不仅是馈赠嘉宾的厚礼，具有收藏价值，而且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建构和谐社会，具有不容低估的积极意义。

中华诗歌，源远流长，《诗经》《楚辞》，初创辉煌。《诗经》以四言为主，又杂以三言、五言、六言、七言乃至九言的各种句式；有通篇四言的齐言诗，又有一篇之中长短句交错的杂言诗。这既表明《诗经》的形式并不单一，又可以清楚地看出，这里已孕育着此后产生多样诗体的萌芽。《楚辞》从内容到形式，是特定历史情况下楚地文化与中原文化交融的产儿，句式加长，句中或句末的“兮”字曼声咏叹，情韵悠扬。《诗经》《楚辞》以后，各种新体诗不断出现。由汉魏而六朝，五言诗已十分成熟，七言诗也已形成；而在乐府民歌中，既有五言、七言的齐言诗，又有句式多变的杂言体。到了唐代，近体诗基本定型，便把唐前的各种诗体分别称为古体诗、乐府诗。近体诗是严格的格律诗，古体诗和乐府诗则相对自由。近体诗包括五言绝句、五言律诗、五言



排律和七言绝句、七言律诗、七言排律，在唐代盛开灿烂的艺术之花，争奇斗丽；而各种古体诗和乐府诗的创作，也精益求精，盛况空前。晚唐以后，宋词、元曲大放异彩，名家辈出，灿若群星，流风余韵，至今未衰。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每一种新诗体的出现，只给诗歌的百花园中增光添彩，而不取代任何尚有生命力的原有诗体。相反，原有的各种诗体，也在适应反映新的社会生活、抒发新的思想情感、表现新的时代精神的要求，不断开拓和创新。中华民族是饶有诗情诗意的民族，也是自强不息，富有创造力的民族。这在三千多年的诗歌发展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巍巍中华素有“诗国”之誉，良非偶然。

世界诗歌本以格律诗为主流。到了近代，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1819—1892)以其自由诗《草叶集》反对压迫奴役，歌颂自由民主，产生了巨大影响。“五四”时期的狂飙突进精神，使郭沫若“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感情”从惠特曼的自由诗中找到喷火口，写出了大气磅礴的自由诗《女神》，壮大了“五四”新诗的声势。然而“五四”新诗运动彻底否定传统，用“死文学”骂倒一切，热衷于纵向“断裂”而醉心于横向“移植”，却是片面的。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是文学艺术发展的规律。著名新诗人闻一多即对《女神》的“十分欧化”提出批评，主张



“恢复我们对于旧文学底信仰”，并赋诗表态：“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舛舌总猜疑。唐贤读破三千卷，勒马回缰作旧诗。”新诗名家在经过长期探索之后“勒马回缰作旧诗”的人很多，例如郭沫若，就在1956年发表的《谈诗歌问题》中声明：“以前我们犯了错误，低估了优良传统”，晚年创作了上千首旧体诗。臧克家晚年也只写旧体诗，自称“旧诗新诗我都爱，我是一个两面派”。中华诗词学会中先写新诗而后作旧体诗的有一大群，号称“两栖”诗人。

“五四”以来，“旧体诗”虽受压抑，但依然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日寇侵华，中华民族奋起抗击，诗词家扬御侮之巨纛，震大汉之天声，写民族之心曲，播时代之强音。杨金亭主编的《中国抗战诗词精选》包含500多首抗战佳作，无愧诗史。改革开放，大地春回，“诗词热”不断升温。据了解，全国各级各类诗词学会数以千计，各学会多有诗词刊物；中华诗词学会仅个人会员数以万计，会刊《中华诗词》每年六期，畅销全国，流布海外；《光明日报》《诗刊》等也开辟了诗词专栏或专页；经常参加诗词活动的积极分子，远超百万之众；每年发表的诗词作品，跨越《全唐诗》的总数。毫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华诗词已赢得了空前的大繁荣、大普及。在普及



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中华“诗国”必将大放光芒于五洲。

“五四”迄今，新诗已有90年的发展史，有远见的新诗人先后开展过多次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在创作实践上于“自由体”之外出现的“格律体”和“歌谣体”，都表现了为解决新诗“民族化”“群众化”而作的努力，也积累了许多新颖的表现方法和艺术技巧。杰出诗人的优秀作品，在广大读者中广泛传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汶川抗震后，一度沉寂的新诗突发“井喷”，反映之快，佳作之多，震撼力之巨，都令人惊喜不已。

中华诗史上曾出现过多次辉煌时期，令人神往。我们欣逢中华巨龙腾飞的新时代，立足中华，放眼世界，无穷无尽的大好题材呼唤我们各挥彩笔，竞谱华章。祝愿新诗人和诗词家团结起来，互相促进，再创辉煌。

霍松林

2009年4月8日



前言

诗歌，是文学大家族中历史最悠久、也最便于传播和吟唱的一种文体。从《弹歌》、《击壤歌》等远古歌谣开始，经过《诗经》、《楚辞》的发扬蹈厉，再经过汉乐府、文人五言诗和六朝诗歌的发展嬗变，中国诗歌终于由涓涓细流汇聚成一条九曲长河，至唐宋两代掀起了滔天的巨浪。一般读者提起诗歌，首先想到和推崇的往往是唐诗，是李白、杜甫，这自然是不错的。然而，如果没有此前数千年的诗歌发展和艺术积淀，没有屈原、曹植、阮籍、左思、陶渊明、谢灵运、鲍照、庾信等大家、名家和众多二三流诗人的奋力开拓，唐诗的高潮就不会出现，李白、杜甫也绝难达到现有的成就。数典不宜忘祖，饮水自应思源，这部《先秦汉魏六朝诗歌精选》，便是出于这种考虑，着眼于诗歌之源及其发展流变，而编纂的一部唐前优秀诗歌的选集。

所谓“先秦”，指的是秦以前的上古时期。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段中，最先映入人们眼帘的，除了那些篇幅短小、格调古朴的远古歌谣之外，便是《诗经》中收集的305篇群体吟唱了。这些诗歌的创作时间，大致从商末周初至春秋中叶，包括风、雅、颂三大系列。风，指从周王室十五属国收集来的民间诗歌；雅，分大、小雅，多为贵族创作；颂，是宗庙祭祀等场合专用的乐歌。这三大系列中的国风和小雅最值得重视，其中有劳人思妇的哀怨，有征旅戍边的艰辛，有对统治者的

批判，也有年轻恋人欢快的歌吟。《秦风·蒹葭》写思而不得的怅惘，苍凉渺远，堪称“入神之笔”（姚际恒《诗经通论》）；《王风·黍离》写故国之悲，一往情深，令人“唏嘘欲绝”（吴闿生《诗义会通》）；《邶风·燕燕》写送别场面，凄楚无限，被誉为“万古送别之祖”（王士禛《分甘余话》）；《小雅·采薇》写征夫情怀，情真景真，“历汉魏南朝至唐，屡见诗人追摹，而终有弗逮。”（陈子展《诗经直解》）类似这样的精美篇章，在《诗经》中可以说不胜枚举。

《诗经》中的诗多是四言一句，两字一个音组，节奏分明，古朴厚重；而在章法上，多重叠回环，反复咏叹，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其表现方法，往往是赋、比、兴三者交错运用，既增加了诗歌的形象感和情感张力，又创立了中国诗歌“美刺比兴”的传统。由此而言，《诗经》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而且是后世诗歌表现内容和创作方法上的一个总的源泉。

在北方黄河流域诗人们的群体歌吟停歇了二百多年后，南中国长江流域的大地上，又站起了伟大的辞赋家屈原和宋玉。屈原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政治家。他理想高远，才华超卓，本欲为楚国的兴盛大展宏图，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史记·屈原列传》），惨遭流放厄运。怀着满腹的哀怨和不平，屈原在流放途中创作出《离骚》、

《九章》、《天问》等长篇抒情之作，极大地扩充了诗歌的容量，提升了抒情诗的质素。《离骚》共373句，2490字，其中反复回荡的，是作者对理想的执著，对政敌的抨击，对个体悲情的抒发，对故国旧乡的眷恋。这是古今第一长诗，也是奠定屈原作为中国第一伟大诗人的基石。此外，屈原还作有《九章》（共9篇）、《九歌》（共11篇）等诗作。

《九章》中的《哀郢》被视为“小《离骚》”，凄楚悲怨之至；《怀沙》则是屈原的绝命诗，表现的更是一种对人格的最终持守。《九歌》据说是屈原在楚地民间乐舞基础上整理创作而成，其中的《湘夫人》写

洞庭景色，“模想无穷之趣，如在目前”（吴子良《林下偶谈》）；《山鬼》写深山情景，“如入深径无人觉，古藤枯木皆有奇致”（明蒋之翘评校本《楚辞集注》引桑悦语）。至于宋玉所作《九辩》，则以其“悲哉秋之为气也”的发端惊唱，开启了中国古代悲秋传统的先河。

屈原、宋玉诸作，“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黄伯思《新校〈楚辞〉序》）与《诗经》相比，《楚辞》句式加长，四、五、六、七言皆有，而且句中或句末伴随着“兮”字的大量使用，强化了诗歌的咏叹情韵。至于比兴特别是“比”的手法，不仅运用得更为广泛，而且向上提升一步，构成某种整体的象征。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指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这段话，可以说是对《楚辞》特点的一个准确概括，也是对屈原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的定评。

《诗经》和《楚辞》，作为早期中国文学史的双璧，给予后世文人创作以巨大的影响。从整体风格看，其一重写实，一重想象；一偏于质朴，一偏于华美；一如北方的群山，显示出厚重的本色，一如南方的长河，显示出奔腾的大气。这些差异和特点，是我们阅读这两部经典时，不可不注意的。

两汉以降，便进入中古时期。如果说，上古时期的《诗经》、《楚辞》是诗之源、诗之本，那么，中古时期的文人创作便是诗之流、诗之变。

按照常理，汉人去古未远，前有诗、骚的范本，只要放手去写，便不难在诗歌创作上取得大的成就。然而，历史的偶然性在这里发挥了作用，时代的文化氛围使汉人改变了努力的方向，他们似乎于诗歌创作并

不热心，而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到了散文和大赋上，从而导致西汉两百年间竟未出现像样的文人诗作。相比之下，倒是那些驰骋于沙场的战将和统驭万方的帝王，如项羽、刘邦、汉武帝刘彻等，吟出了《垓下歌》、

《大风歌》、《秋风辞》这样一些颇具气势和情韵的楚歌体作品；而身居社会最底层、从未停止过吟唱的劳人思妇们，则为当时的诗坛贡献出了大量民间的歌谣。这些民歌经汉武帝所设“乐府”这一专门音乐机关的搜集整理，配上音乐传唱，竟然不乏感人的魅力，并成为此后文人效法的另一个样板。这些被后人称为“汉乐府”的民歌，一般篇幅不长，多为三、五、七言交织的杂言体，反映的主要是下层民众的生活实况。

诸如《孤儿行》写孤儿受兄嫂奴役的生活悲苦，《战城南》写战争给民生带来的严重破坏，《上邪》表现恋人对爱情的极度忠贞，《怨歌行》表现女子恐被弃捐的深深忧虑，都具有叙事真切、抒情畅达、质朴自然、明白如话的特点，用班固的话说，便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至于《陌上桑》、《焦仲卿妻》等叙事写情的名作，其句式已由杂言发展为整齐的五言，篇幅大大扩充，表现手法也更为精纯，则已是经过文人整理加工的东汉晚期的作品了。

自东汉至隋，共经历了八个朝代，前人习惯上将之称为“八代”。又因三国之吴、东晋和此后南朝的宋、齐、梁、陈均建都长江边上的建康（今南京），故简称六朝。如果以“八代”作为一个时间段，那么，在这一长达600年的历史中，除去那些无名氏诗人，有诗作留存的诗人共617人，诗歌总量达5798首（见拙作《八代诗歌分布情形与发展态势的定量分析》，载《东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五言诗作品。这一情况说明，从东汉开始，中古诗歌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而五言诗的创作，更是达到了空前的繁盛。

一般认为，东汉是文人五言诗的发轫期，现在能看到的，虽然有班固《咏史》、秦嘉《赠妇诗》、赵壹《疾邪诗》、辛延年《羽林郎》等

作品，但代表此一时期最高成就的，却是那些无名氏创作的五言古诗。而被萧统《文选》收录的十九首古诗，更是受到了古今评家的一致推崇。这些诗作，表现的主要是社会动荡时期下层文人的命运悲叹和人生思考，而别离、回归、相思、生死，则是其反复咏歌的核心母题。从艺术特点看，这些诗作既具民歌的情调，又有文人诗的精美，既有比兴手法的妙用，又有情景交融的描写，可以说委婉含蓄，惊警动人。钟嵘《诗品》评价说：“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对照《古诗十九首》的实际成就，这个看似极高的评语并不过分。

东汉献帝建安年间及此后的魏明帝正始前后，涌现出以三曹、建安七子以及阮籍、嵇康为代表的一批诗人。他们在艺术上充分吸取了诗、骚和《古诗十九首》的成功经验，而在表现领域和思想内容上又予以大的扩展和提升，使得在诗歌创作上，这一时期成为八代诗史中最为繁盛的一个时期，也成为文人五言诗创作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有诗作存世的诗人共35人，但其作品量却多达530首，由此可知此期诗歌创作的基本情形。从社会政治层面看，建安时期陷入空前的动荡、离乱之中，政治腐败，军阀争战，灾疫流行，生灵涂炭，曹操《蒿里行》所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应是真实的写照。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不能不使建安诗歌濡染上浓郁的悲凉色彩，而此期诗人普遍表现出的戮力社稷、平定天下的“烈士悲心”和慷慨任气，又给其作品增添了一种慷慨劲健的格调。悲凉加慷慨，遂成为建安诗歌的典型风格，并由此凝聚为饱含遒劲力度的“建安风骨”，成为后世诗人学习的典范。曹操半生戎马，睥睨一世，发而为诗，古直悲凉。他有一些不错的五言诗作，如《蒿里行》、《苦寒行》等，但他的四言诗更为出色，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诸篇，皆“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敖陶孙《诗评》）。其子曹植才高八斗，志向远大，前期作品多写其建功立

业的抱负，展示出“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志节，后期因受曹丕迫害，则多用比兴寄托手法抒写内心的苦闷，充满“高树多悲风”的愤激。《白马篇》、《美女篇》、《赠白马王彪》和《杂诗》，都是五言诗中的精品，曹植也因他的这些作品而被誉为“粲溢今古，卓尔不群”（钟嵘《诗品》）的“建安诗杰”。在曹氏父子影响下，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幹等建安七子也都有一批反映现实、表现情感的力作。其中王粲成就较高，刘桢诗风挺拔，故常被人与曹植并称为“曹王”、“曹刘”。至于曹操的另一个儿子、后来做了帝王的曹丕，其诗虽较少联系现实，但描写细腻，风格清丽，其《燕歌行》更被视为第一首体制完备的文人七言诗，而受到后世的重视。

与建安诗歌慷慨劲直的风格相比，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的阮籍、嵇康的诗风又有了新的变化。嵇康心性磊落，气格清峻，倡言“越名教而任自然”。所作四言组诗《赠秀才入军》词语隽逸，简洁通脱，最能代表他的诗风。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但身处腐败无能的曹魏政权与图谋篡权的司马氏集团的夹缝中，时时感受到巨大的压抑和生命的忧恐，于是借酣饮以避世，将其愤世嫉俗之心、忧时嗟生之叹写入诗篇，共82首，名之曰《咏怀》。这些诗作的一大特点便是以比兴寄托等隐蔽曲折的手法，来表现作者刺世的旨意和苦闷的心绪。前人多说读阮籍诗费解，这是确实的，但阮诗的费解主要在意义层面，而在文字层面，词显意深，托兴高远，反倒扩大了阮诗的意义空间和诱人魅力。后人给《咏怀》诗以很高的评价，并自觉学习其表现手法，创作出不少以《咏怀》、《感遇》或《无题》命名的诗作，便说明了阮诗的价值所在。

进入两晋以后，诗坛有几点新的变化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表现领域进一步扩大，且多以组诗的形式出现。如左思的《咏史》组诗，郭璞的《游仙》组诗，孙绰的玄言之作，陶渊明对田园的系列歌咏，都是前

人没有或较少涉及的题材和形式；二是开始有意识地模拟古人，出现了不少拟古诗作，其中以陆机对《古诗十九首》的拟作及其乐府诗最具代表性；三是逐渐脱离了建安诗歌瞩目现实、慷慨悲歌的创作传统，而走上重形式、重词藻、重华美的路途。在两晋150多年的时间中，有诗作存世的作者共137人，诗歌存量1005首。这个数字，比此前东汉和曹魏两代的总和还要多一倍，说明此期创作较为发达，但从作品质量讲，真正有大成就的作者并不多。钟嵘曾将西晋的著名诗人概括为“三张（张载、张协、张亢兄弟）、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潘尼叔侄）、一左（左思）”，这是当时的评价，今天看来，大概只有左思最为突出。左思才华卓然，却因家世寒微而不被重用。面对“世胄躋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混浊现实，他愤声高呼：“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他的八首《咏史》诗，都是借史明志、以古喻今、批判现实、维护自我人格的力作。后人称道左思胸怀高旷，笔力雄迈，并用“左思风力”来概括其诗的基本特征，可以说看中的正是他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左思一样受到建安风骨影响的，还有稍后的刘琨。刘琨早年曾与祖逖同床共寝，中夜闻鸡起舞，以雄豪著名。后率兵征战，备极艰辛，所作《扶风歌》、《重赠卢谡》，表现其“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志节和英雄末路之悲，沉郁苍劲，极具感染力。

东晋末年陶渊明的出现，给两晋诗坛乃至整个中国诗史，添加了一道绚丽夺目的光彩。这位被钟嵘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大诗人，于四十岁辞绝官场，归隐田园，过起了种豆南山下、采菊东篱旁的生活。在他大量描写田园生活的诗篇中，没有充斥当时诗坛的玄言气息，只有任真自得的情怀和理趣；没有天人的对立和纷扰，只有心物的沟通与交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正是这样的境界，使诗人悠然自得，也使其诗既清淡闲雅又饱含浓郁的生活

气息，从而开创了中国诗史中描写田园诗的传统。苏轼说陶诗的特点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诗话录》），沈德潜说陶诗“清远闲放，是其本色，而其中自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几及处。”（《古诗源》）都应是很准确的评价。

南北朝时期（主要是南朝）是中古诗歌的另一个繁荣期。这种繁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民歌创作南北呼应，创获颇多，分别涌现出《西州曲》、《木兰诗》这样的杰作，形成了《诗经》、汉乐府后的另一个民歌高潮。其二是文人创作持续发展，作者数和作品量急剧扩大。据我们统计，此期有诗作存世的作者共360人，诗歌作品3964首，二者均远远超出与之时间相等的两晋时段。其三是南北相比，南朝独盛。由于自东晋开始建都江南的缘故，大量衣冠士族南迁建康，统治者也多是好文之主，遂使得南中国的文化氛围日益浓厚，文学创作水平迅速提升。与之相比，原来处于文化优势地位的北中国，由于若干少数民族政权的频繁更迭，以及忽视文化建设等原因，反而处于严重的滞后、衰落态势。就作者、作品数而论，南朝宋、齐、梁、陈四代有诗作存世的作者共276人，作品3471首；而北朝则仅有84人，493首诗。这样一个数据，已清晰反映出南北两地的巨大悬殊。

谢灵运、颜延之是由东晋入刘宋的诗人，他们与比其年龄稍小的鲍照都在宋文帝元嘉年间从事过创作活动，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所以史称“元嘉三大家”。现在看来，三人中谢、鲍的成就要突出一些，而谢灵运更以其对自然山水的钟情和多方面表现，成为中国诗史上全力创作山水诗的第一人。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山水成了给他慰藉的伴侣，也成了他审美观照的对象。“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诗句不深奥，却很美，很耐人寻味。作为早期作品，其意义在于作者借歌咏山水寄寓超脱尘世的情志，而这正是当时山水诗创作中的普遍倾向。此后，经过南朝诗人谢朓等人的努力，山

水诗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为唐宋山水田园诗创作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谢灵运相比，出身寒微的鲍照更多表现出对社会不公的抗议，以及寒士阶层备受压抑的激愤。情绪冲动时，他拔剑击柱，仰天叹息，诗的字里行间涌动着一股莫名的悲慨和悲哀。他的不少乐府诗和七言诗，都具有慷慨任气、高亢激烈的特点，与建安诗、左思诗有着内在精神的相通，最能代表其诗的风格。

齐永明年间是中古诗歌的一个转变期。沈约、谢朓等人将平上去入四声用到诗歌创作中去，并制定了若干规则，使得“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论》），具有一种抑扬顿挫的声韵美，从而将此前纯任自然的诗歌创作带上了格律化的道路。不过，这种被后人称为“永明体”的新体诗，在他们成功的诗作中所占比重并不大，为谢朓赢得巨大声誉的，倒是那些并未刻意讲求声律的描摹自然山水的佳作。“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这样一些或发端惊警，或清新秀丽的诗句，成为谢诗的一道风景，吸引了后世众多诗人的目光，以致连大诗人李白也“一生低首谢宣城”（王士禛《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其三）。

梁、陈两代，由于统治者喜作艳诗，一批宫廷诗人遂投其所好，争相创作，于是产生了大量屡屡为后人诟病的“宫体”之作。这些诗歌多内容空虚，流于形式美的追求，固不足取；但就其对新体诗的艺术实践而言，也还是颇有价值的。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有庾肩吾、徐陵、何逊、阴铿等人，不过他们的成就，比起稍后的庾信却远有不及。庾信是庾肩吾之子，早年出入梁朝宫廷，所作诗亦为宫体一路。四十三岁时出使西魏，被羁留长安，后又被迫出仕北周，度过了近三十年有家难归的岁月。特殊的经历，大大增加了其诗的故国之悲、乡关之思和风霜之气，而良好的文学素养和老而弥精的创作技法，使他的不少五、七言诗作均戛戛独造，音律和谐，已与唐人的律体相当接近了。明人